

北、高市長選舉之評析

徐永明 / 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助研究員

作為台灣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兩個都市，北、高市長選舉的結果在統計抽樣上不一定有「代表性」，不足以推論台灣整體民意的走向；但在觀察台灣政治發展的進程上，確有相當的「指標性」意涵，尤其是對於後續政治情勢的影響。

因此當民進黨現任高雄市長謝長廷以兩萬多票之差贏得連任，而台北市則同樣由現任市長馬英九以三十八萬之差勝出時，雖然同是現任者連任成功的地方層級選舉，其結果並不影響中央政權的更替，但是如果細究其歷來選票的變化趨勢，很清楚地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一些資訊與教訓。

雙城故事

例如在台北市，民進黨1994年議員選舉選票不足三成，1998年議員選舉則成長至三成多的選票，這次議員選舉，民進黨加上台聯後，泛綠共計三成二，幾乎和前幾次維持平盤的狀態。同樣的穩定結構表現在歷來北市立委選舉的部分，去年的得票率是三成四，1998年是三成六，1995年則是維持三成六，代表台北市選民中民進黨有三成至三成五的基本盤，而且不受選舉層次與類別的影響。

而表現在首長選舉則是另一番景象，1998年陳水扁爭取連任時有近四成六的選票，2000年的總統選舉陳水扁在台北市的

選票則降為三成八，這次李應元的得票是新低，僅三成六。對比於上述市議員與立委的穩定選票基盤，民進黨在台北市的發展有賴於首長選舉的衝鋒陷陣，此時候選人的特質就變得相當中重要，影響了選票的擴張或萎縮。

不過值得玩味的是，當「主客觀條件」都有所不足時，民進黨仍在台北有目前的基本盤表現，不得不令人對民進黨支持者穩定的忠誠度感到好奇，而這個選票的超穩定性也解釋了為何民進黨總能在逆境中成長，雖然選票未過半，但能進行政黨輪替，擁有目前的中央政權。

而在高雄市，民進黨1994年議員選舉選票不足二成五（比同時台北市的三成差），1998年議員選舉則成長至二成六的選票，這次議員選舉，民進黨加上台聯後，泛綠共計三成二，與前幾次相比呈現一個成長的趨勢。同樣的成長結構表現在歷來高雄市立委選舉的部分，去年的得票率是三成六，1998年同樣是三成六，1995年則是三成多，這顯示高雄是民進黨成長擴張的地區，同時各選舉層次的差異呈現匯合的趨勢，最頂端為市長的五成過半得票率。

高雄市民進黨首長選舉的表現則是新興的景象，1998年謝長廷挑戰吳敦義成功時有近四成九的選票，2000年總統選舉陳水扁在高雄市的選票則略降為四成五，這次

謝長廷的得票率是新高，達五成以上。對比於上述市議員與立委選票的成長趨勢，民進黨在高雄市的發展是呈現各類選舉並進的步調，而以首長選舉開拓新的選票版圖。

所以，北、高兩市的選舉對於民進黨而言是有指標性的作用，不但呈現南北的差異，也提示泛綠陣營未來發展的路徑與障礙。高雄作為南台的首府，歷來民進黨的選票發展是穩定中求成長，所以這次謝長廷的連任成功是可預期的，只是沒想到會是在一個小勝的狀態下，不如選戰初期預測的輕鬆，但是如果回到前面關於歷來高雄選票的表現來看，這個選票結構也不容民進黨太過樂觀的。

相對的，民進黨在台北市的選票發展面臨一個瓶頸，不單表現為議員、立委的平盤發展，更具現為首長選舉的起起伏伏，李應元的得票率不一定是候選人政治生涯的谷底，卻絕對是民進黨的新低，當選票的發展邏輯不是成長就是衰退時，台北市逐漸成為民進黨的艱難挑戰區域，加上政經資源過度集中的城鄉效果，選舉的政治效應亦出奇地巨大，因此如何解讀選舉結果的複雜意涵，成為政治領袖的首要工作。

選舉啟示錄

如果說選舉是透過一張張選票加總，形成具象的「人民意志」，一個個選舉結果的呈現，可說是造成一個形勢，將台灣導入一條似乎預設的道路。這不禁令人對於民主政治的精巧與靈活感到興味，民進黨雖然在台北市大敗，但是高雄的勝利則又撫慰了懷憂的心緒，人民的疼愛不是沒有道理的，執政能力不足反映在台北的失

利，尤其是在地域上的南北的巨大差異，提示了民進黨必須在既有的地域、族群以及意識形態基礎上擴充，尤其是透過改革能力的展現，為人民的生活作多。否則南北的政治差距一旦確立，未來民進黨執政改革的序列會受到干擾。

當朝野對峙中旗幟鮮明各為己時，選舉是一個讓人民發聲的機會，選票加總的結果不只是決定政治人物個別的成敗、政黨團體的前途，更是一個意義豐富的象徵，亟待政治菁英解讀，靜靜地傾聽其中人民的聲音。這樣的人民行動透過選票加總來與菁英互動，進而牽制菁英的行為，大概是民主體制中「代表」概念精義的展現：人民的選票不是被收買的對象，也不是交換的禮物，而是一道命題的提出，提示民心的向背與問題的所在。

選舉鐘擺

如果就北、高選舉個別結果來評論，如前所分析的，台北市對於民進黨成為一個膠著的戰區，同時提供一個執政的試煉：首先，所謂民進黨的執政優勢在台北並不一定存在，反倒是執政改革所引來的反彈，尤其是經濟衰退的壓迫感，台北市民對於這個變化是特別敏感。在資訊混亂的不確定感中，執政者自然成為指責的對象，因此當李應元是阿扁欽點時，自然執政優勢轉為包袱。

再者，台北與高雄作為台灣南北輝映的大城，性格上大不相同。台北作為首都，國際化程度高，省籍的群聚清楚，雖多是城鄉移民，但是與台灣南部的聯繫微弱，逐漸在全球化的潮流下，發展出獨特的個性與認同，在經濟水準上也逐漸與台灣其他地區產生一定的落差，甚至在人口流動

上產生排他的效果。因此，當南北均衡成為民進黨政府的改革焦點時，台北的反彈是可預期的，而馬英九此時趁勢成為反彈的代表人物，是有選票動員與政治期望匯聚的效果。

而從選舉的鐘擺與規律來看，民進黨在高雄的勝選必須克服歷史發展的節奏，尤其在歷經2000年總統的阿扁勝出、上次立委選舉國民黨的崩盤後，泛藍的支持者正在選舉鐘擺擺幅的盡頭，處於一種緊繃而團結的情境中。相對的，泛綠的支持者鬆散，並對民進黨的執政有信心問題，一鬆一緊間就將選舉的鐘擺盪回了泛藍這邊，表現為泛藍在台北的大勝，而這個反彈的效應的確促成高雄的危機意識，形成藍、綠的均勢抗衡。

世代的議程

當選舉將馬英九製造成新一代的政治明星，其鋒芒直逼陳水扁總統，同時帶動泛藍政團進一步合流的趨勢，許多觀察更進一步探討2004年總統人選組合的可能，從「連、宋合」、「馬、吳配」到「連、馬配」等不一而足，顯示泛藍推出一組候選人的期望相當高，也代表選民與政治人物的學習能力相當強，自過去的經驗學習選舉作為一個賽局的勝負關鍵為何：即簡化可能的候選人組合，極大化相近選民的動員。

如果以台灣政黨體系的分合為觀察對象，過去十年巨大變動的根源在於國民黨的分裂，而分裂的「扳機（trigger）」多在選舉提名的衝突，進而將意識形態與路線的分歧表現為菁英的出走與新興政黨的出現，這從1993年新黨的出走，1994年趙少康北市參選形成首次三方競爭，1996年林、陳以獨立候選身份參選總統，2000年

宋楚瑜參選形成第二次三方競爭，乃至這次北、高市長提名的討論，在在顯示選舉提名不但決定了選舉的結果，也影響了台灣各政黨的命運，以及整個政黨體系發展的方向。

相對的，民進黨顯得相當穩定，出走的黨主席都無力形成相競爭的政治基礎，只能在藍綠間遊移，因此當民進黨的基盤是穩定而堅實的少數力量，卻能一路攀升取得中央政權，這顯示民主選舉比的不只是人頭的數目，而是選票間的整合能力與方向的一致性，越穩定的選票越能支持出勝選的候選人，這見證於民進黨十年來立委選票的平盤，卻開出步步高昇的立委席次；當然陳水扁的選舉前景更是與這股泛綠的凝聚力息息相關，他之所以能勝出，是因為他能將自己放在這個大眾期望的焦點上，如浪頭般推向高處。

但是馬英九作為泛藍的選項，卻也帶來兩個整合上的分歧，一個是菁英層次的，少為人提及，但是相當顯著的，即馬英九所帶來的世代接班浪潮，連、宋立即面臨這股壓力，迫使他們在政治志業上為自己作一個定位。相對的，民進黨這個世代交替問題，在幾位黨主席出走、退隱之後就無形中解決了，新的領導世代比較年輕與穩定，執政也帶來相當的空間。或許從國民黨、民進黨競爭的架構來觀察，世代交替的速度決定了兩黨的選舉勝敗，乃至台灣政權的歸屬。

決戰總統選舉

馬英九選項的另一個分歧發生則是外顯的，群眾層次的，省籍與地域上的分歧，這也是為何「連、宋配」逐漸乏人問津，重點不是所謂的省籍搭配，而在於整合選

票的能力問題，尤其是聯繫不同族群間的利益與認同，這方面能力的貧弱是泛藍菁英普遍的缺點。這也是為何陳水扁陣營心態上應有相當的準備，在2004年進行一對一的競爭，透過改革路線來建構過半數選票的認同。

從歷史經驗的總結來看，分裂社會的選舉取決於三種選民，穩定的是藍、綠的選民，透過動員與團結決定選票是否開出；再者是中間的務實選民，取決於經濟與安

全因素，影響選舉的差距與勝負；最後是新進選民，以政治領袖的認同為取向，影響政黨長期發展的基盤。

顯然未來的選舉挑戰中，民進黨必須在動員泛綠基本選民的前提下，擴張其在新進選民的感染力，最後以游離選民的務實考量為決戰的壕溝，這是扭轉選舉鐘擺的勝選程序，考驗民進黨人的思維與能力，也預示著下次總統大選的發展路徑。